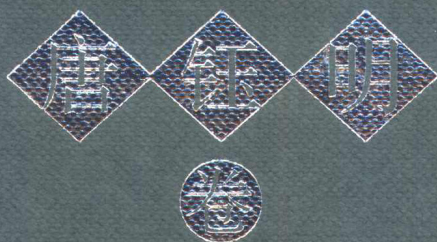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唐钰明卷 / 唐钰明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4

ISBN 7-5336-2846-2

I. 著... II. 唐...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唐钰明—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081 号

责任编辑: 姚莉 装帧设计: 包云鹂 马芳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40 000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20.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2651321

邮 编: 230061

缘 起

199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在吕叔湘等先生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这套丛书面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如今七年过去了,当年入选《自选集》的作者正逐渐步入老年,而新的一批功底扎实、卓有建树的中年语言学家又不断涌现出来。有鉴于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征询了语言学界一些学者的意见,拟继续编辑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这套丛书编辑工作始于1999年。是年3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有关编辑专程进京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相关学者商谈《自选集》的编辑体例、运作规程以及有关细节,并商定由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吴福祥和安徽教育出版社万直纯、姚莉三位组成《自选集》编辑小组。为确保这套丛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编辑组特别聘请了郭锡良等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做这套丛书的学术指导,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听取了语言学界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的建议和意见。

同年五月,编辑组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自选集》入选对象的条件和依据:

1. 主要从事汉语(包括汉字)研究或者与汉语相关的语言理论研究。
2. 在特定的研究领域里做出突出贡献并在语言学界具有一定影响。

3. 年龄在 45~60 岁之间,工作单位限于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

4. 适当兼顾学科、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根据上述条件,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编辑组拟出一份仅供咨询、参考的候选名单,分别寄呈各位学术指导,请他们以在候选名单上画圈的方式推荐《自选集》的作者。

最后,根据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 16 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的推荐意见,编辑组按得票数排出了被推荐人的名次。其中前十位被推荐者是:江蓝生、马庆株、沈家煊、唐钰明、项楚、潘悟云、李家浩、游汝杰、张振兴、邵敬敏。

这套《自选集》能够顺利编辑出版,首先要感谢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 16 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他们对本丛书编辑工作所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体现了老一代语言学家对中年语言学家的热情扶植和对汉语语言学事业的挚爱。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自选集》作者之一江蓝生教授为本丛书的编辑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江先生从选题的策划论证、编辑体例的确定直到稿件的审读都给编辑组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事实上,在本丛书编辑工作之初,江先生是以主编的身分参加编辑组的具体工作的,只是后来得知自己被学术指导推荐为《自选集》作者之一时,才再三要求辞去主编之职。编辑组经过认真考虑觉得应该尊重江先生的意愿。

我们也应该感谢《自选集》的诸位作者,他们愿意把自己学术成果的精华交给我们编辑出版,这是对我们的莫大信任。

我们缺少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的经验,错误和不当之处尚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编辑组

2001 年 12 月

作者简介

唐钰明,1944年出生,广东新会人。1962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分配到武汉钢铁公司工作。1978年重返母校,师从容庚教授、商承祚教授攻读古文字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广东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

唐钰明以古文字学为专业基础、以汉语语法史为主攻方向,致力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研究,已刊布著作2种、论文60余篇。所涉及的主要研究领域有:

一、古文字。对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简帛文字,从形体出发而又不拘泥于形体,善于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和应用。代表作是《出、又考辨》、《铜器铭文释读二题》。

二、词汇史。研究的视界由殷商甲骨文直至现代汉语方言,值得称道之处是引入定量方法来进行考察。代表作是《甲金文词义辨析两则》、《“亿”表“十万”和“万万”的时代层次》。

三、语法史。这是作者研究的主要着力点,也是最受注目的部分。其特点是:(1)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2)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3)运用以提取性为原则的变换方法。代表作是《其、厥考辨》、《甲骨文“唯宾动”式及其蜕变》、《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古汉语“动+之+名”结构的变换分析》。

唐钰明的学术建树和治学风格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相继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奖励。例如:1988年《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二等奖;1993年《甲骨文

“唯宾动”式及其蜕变》获得“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三等奖;1995年《论先秦汉语被动式的发展》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8年《中古“是”字判断句述要》获得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除了学术奖励之外,唐钰明还获得一些荣誉性鼓励。例如:1991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称号;1993年由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等等。

目 录

四十年来的古汉语语法研究	(1)
古文字资料的语法研究述评	(8)
定量方法与古文字资料的词汇语法研究	(23)
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变换”问题	(32)
顾炎武的训诂学	(51)
出、又考辨	(68)
卜辞“我其已宾乍帝降若”解	(77)
异文在释读铜器铭文中的作用	(82)
铜器铭文释读二题	(93)
重论“麻夷非是”	(101)
战国文字资料释读三题	(111)
金文复音词简论	
——兼论汉语复音化的起源	(117)
甲金文词义辨析两则	(136)
据金文解读《尚书》二例	(145)
“臭”字字义演变简析	(152)

“亿”表“十万”和“万万”的时代层次	(161)
“高买”探源	
——兼论隐语的通用化	(167)
北京新词“侃”的运动轨迹试探	(174)
其、厥考辨	(180)
“之”字复指说献疑	(189)
古国族名前的“有”字不能作实词解	(196)
古汉语动量表示法探源	(201)
甲骨文“唯宾动”式及其蜕变	(207)
古汉语“动+之+名”结构的变换分析	(219)
上古判断句的变换考察	(229)
上古判断句辨析	(233)
中古“是”字判断句述要	(239)
论上古汉语被动式的起源	(251)
论先秦汉语被动式的发展	(256)
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	(267)
唐至清的“被”字句	(283)
作者论著目录	(305)
跋	(309)

四十年来的古汉语语法研究^①

一 丰硕的成果

(一)论著

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系统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已超过九十年。将“前五十年”与“后四十年”作比较,其相关数据可构成如下简表:

时 期 类 别	前五十年	后四十年	前后的数量比
研究者	59(人)	632(人)	1:10.7
著 作	31(部)	221(部)	1:7.1
论 文	113(篇)	1457(篇)	1:12.9

表列数据虽属不完全统计(因海外资料不足),但已足以表明“后四十年”所发生的飞跃式的巨大变化了。

四十年来产生了王力《汉语史稿(中册)》、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杨伯峻《文言文法》、王力主编《古代汉语》、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等影响深远的通论性著作,同时

^① 本文以上古、中古为主,较少涉及近代,因“近代”已另立专题。

也涌现了一批异彩纷呈、富有时代特征的专论性著作。这些著作可粗略分为三类。(1)专书研究类,例如向熹《〈诗经〉语言研究》、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许世瑛《〈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戴琰璋《〈孟子〉语法研究》、詹秀慧《〈世说新语〉语法探究》。(2)断代研究类,例如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和《西周金文语法研究》、杜百胜《早周语法》、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牛岛德次《汉语文法论》、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3)专题研究类,例如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王海棻《古汉语疑问词语》、洪成玉《古汉语复音虚词和固定结构》、王克仲《古汉语词类活用》。

以论文形式对专书作出广泛研究的是戴琰璋(遍及《尚书》、《诗经》、《周易》、《左传》、《论语》、《孟子》),而比较深入的是何乐士(《左传》、《史记》)、申小龙(《左传》)、李佐丰(《左传》)、李开(《吕氏春秋》)、韩陈其(《史记》)、柳士镇(《世说新语》),等等。断代研究的论文为数不少,其中旗帜最为鲜明的是程湘清主编的三本论文集:《先秦汉语研究》、《秦汉汉语研究》、《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至于多数论文所着眼的专题研究,下节另作介绍。

(二)专题

四十年来有关词法、句法的具体专题研究,已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某些专题虽仍有争议,但观点、材料得到充分展开,距离解决已经不远。限于篇幅,以下仅列举几个热门论题。(1)代词。在吕叔湘、周法高、黄盛璋、郭锡良、王海棻、江蓝生等学者的努力下,代词由殷商至近代的总体面貌和历史沿革已经比较清晰,其中上古和近代尤为深入。(2)量词。黄盛璋(载君)由甲金文入手,下及两汉,刘世儒主攻魏晋南北朝,马国权、杨晓敏等多方充实,已为量词发展史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3)系词。王力、马忠提出系词“是”起源于西汉末、东汉初,洪诚、敖镜浩推定为西汉初,而裘锡

圭、林序达上溯战国,周光午、任学良等主张春秋乃至西周。(4)被动式。以王力《汉语被动式的发展》为起点,吴金华、董志翘、姚振武、袁宾、江蓝生、张惠英、桥本万太郎等对被动式的流变作了完整而深入的勾勒,由殷周甲金文下及现代汉语方言,均有系统的论述。(5)处置式。意见比较一致的是“将”字句和“把”字句。至于“以”字句是否更早的处置式,本涅特、梅祖麟、陈初生持肯定态度,贝罗贝、张华文持否定态度。(6)动补结构。王力、祝敏彻、余建萍、杨建国、潘允中、太田辰夫、梅祖麟等分别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结果补语的产生”仍有较大分歧。(7)定语后置。谢质彬对杨伯峻等人的“定语后置”说提出异议,引发了一场争论。论者或上溯商周,或下联现代,或旁征汉藏诸语言,而迄今尚未取得共识。

二 重大的推进

(一)理论

四十年前,古汉语语法通常被看做一个平面,生动活泼的语法流变史被处理成相对静止、古今杂糅的“文言文法”。尽管不少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语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层次性,王力、吕叔湘、丁声树等大师还刊布过一些重要的历史语法论文,但与当时文言文法的主流相比,它们不过是一些小浪花。

进入“四十年”这一时期后,小浪花终于化成汹涌的浪潮——历时观念的确立和汉语语法史体系的构建,成为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王力《汉语史稿(中册)》首先以系统的动态研究来取代既往的静态研究,将人们的视界由单一的平面引向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样一个历史连续体。尽管《汉语史稿(中册)》因其草创性而常常引起人们的诘难,但它所建立的汉语语法史框架,却无

疑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稍后,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以其扎实的材料、新颖的构思,对上古、中古语法的不同层面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所不足的是略显庞杂,而遗憾的是未能终卷。至于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作为近代汉语研究的奠基之作,对汉语语法史的构建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近代汉语”的专题中当另有评述)。

历时观念的确立和语法史体系的构建,为古汉语语法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给这个领域带来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历时性的专题探索空前活跃,汉语历史悠久、载籍无比丰富这一优势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这一切,标志着古汉语语法研究在世界历史语言研究中已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

(二)方法

传统所使用的例证法是有成效而不可缺少的,但它又确实存在着“随意引证”的严重缺陷。要对语言现象的随机性加以“管束”,只有坚持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作定性分析。这种方法“前五十年”虽偶有应用(如沈春晖、何定生),但真正成为学者手中的锐利武器,乃“后四十年”的事。前有周光午、周生亚、马悦然等人的身体力行,后有近年崛起的青年学者的广泛应用,定量方法已具有发展为主流的良好趋势。

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传统句法分析堪称根基深厚。近年随着变换分析在现代汉语的成功应用,这种方法也慢慢扩散到古汉语领域。一些中青年学者(例如殷国光)对变换分析在古汉语语法的运用作了很有意义的尝试。然而由于历史语言的研究素来讲究“无征不信”,所以依照现代汉语自编句例、自构模式的办法,常常会使论证发生很大的疑问。例如在“动之名”结构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夺之牛”可以变换为“夺其牛”,是单宾结构,有人认为只能变

换为“夺牛于之”或“向之夺牛”，是双宾结构。双方都声称“变换”，其结果却大相径庭。鉴于此，有学者（例如唐钰明）主张古汉语运用变换方法须以提取典籍固有用例为主。例如：“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史记·陈涉世家》），“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史记·楚世家》），“[汉王]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汉王]驰入韩信壁，夺其军”（《史记·高祖本纪》），同书或同篇中“之”可变换为“其”，说明“夺之牛”确为“动+宾”结构。

以往的研究者比较满足于语言现象的描写而甚少注意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机制，近年不少学者强调要“解释”，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例如桥本万太郎、余志鸿运用语言地理类型等理论解释古汉语语法中的一些现象，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有人认为描写是低层次的、解释是高层次的，这就未免失诸偏颇。实际上，描写是基础、是前提，没有描写就没有解释，二者之间常常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三）材料

新的材料常常带来新的学问。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在以传统典籍为主体的同时，不断努力开掘新材料，其中有两项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其一是出土文献的利用。出土文献主要指：先秦的甲金文和战国文字资料，秦汉魏晋的帛书、简牍、碑刻资料，还有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等等。出土文献保持了历史的原貌，比辗转传抄、屡经后人增删移易的传世文献更足信据，是研究上古、中古汉语的可靠资料。四十年来这些资料系统地应用于古汉语语法研究，为解决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提供了确凿的新证据。其中管燮初、陈梦家、裘锡圭、黄盛璋、黄景欣、司礼仪、高岛谦一、陈初生、冯春田等人的研究较有特色。要用好这些资料，除重视它们内部的系统性之外，还须注意它们与传世文献之间的有机联系。换言之，出土文献与

传世文献互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成功经验。

其二是汉译佛经材料的开发。为便于弘扬佛法、争取教众,佛经的汉译通常尽量口语化,这就使得佛经资料比同时代的正统文献更接近该时代的语言原貌,利用这些语料能够更准确更客观地考察中古、近代语法现象的萌生和流变。在不少海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以及江蓝生、吴金华、袁宾、董志翘、俞理明、王洪君、董琨等人所撰写的语法论文中,对佛经材料都有精彩的开掘。与词汇方面的研究相比,这项材料在语法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东汉魏晋部分)只算是刚起步,英雄们还大有用武之地。

三 明显的不足

(一)理论意识淡薄

古汉语语法研究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已蔚成风气。尽管出现过如前所述的理论建树,尽管余志鸿、王克仲等部分学者一直在努力进行种种探索,诸如语言交融、词汇兴替、重新分析以及语义、语境、语用等新思路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触及,但从总体来说,古汉语语法学界的理论空气是淡薄的,与其他学科(例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形成很大的反差。研究者往往习惯于解决具体问题,而不太善于追求理论上的升华。在这种状态下,不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难以产生,就是把其他领域已大行其道的新思路引入这座殿堂,也往往举步维艰。在保持“实证”这一优良传统的前提下,如何努力增强理论意识以谋求研究水平的提高,将是古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二)研究视界狭窄

近年来,我国语言学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呈现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趋势,例如朱德熙由方言追溯古汉语,梅祖麟、曹广顺由近代

上推中古,俞敏、邢公畹以汉藏语与古汉语互证,等等。相形之下,古汉语语法研究视界狭窄的问题就显得相当突出。研究者的注意力往往停留在某一时段、某本专书、某个专题,这在学科发展的一定阶段无疑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但长期固守一点,却很容易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负面作用。要高瞻远瞩而又不至于游谈无根,看来须强调“视野要广阔,研究要精深”。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不足。例如:相当一部分论著以几部名著为蓝本辗转贩抄,不仅观点照搬,连例句也陈陈相因、懒得替换,颇令人有“水货充斥”之感。这里面除学者自身的学风之外,受商品化浪潮冲击当是更深远的原因,因已超出本文所论,就不去说它了。

(原载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出版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

古文字资料的语法研究述评

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资料的运用,历来有历史和语言两大角度。从语言的角度对古文字资料进行语法研究,自 1928 年至今已有 60 年。对这段历程略加述评,对今后的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本世纪初,我国古文字学和语法学相继兴起。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这两门分别独立发展的学科,开始发生交叉和沟通。

首先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是何定生。1928 年,正就读于中山大学的何氏在顾颉刚的鼓励下,率先在《汉以前的文法研究》一文中讨论了甲骨文的人称代词,随后在《〈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一文中又涉及了金文的个别代词。何氏这两篇论文以及他和杨筠如、卫聚贤等人就甲、金文文法所展开的通讯讨论,都集中刊载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上,因而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理论上,何氏也提出了“古代的文法,是有时代的演变的”、“不以一二例子定通则,不以一二例子破通则”等可取的原则。但在解决甲、金文的具体语法问题上,何氏并未作出有价值的建树。相比之下,倒是胡光炜 1928 年的《甲骨文例》和容庚 1929 年的《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比较能解决实际问题。《甲骨文例》本来旨在揭示甲骨文行文的体例,但卷下“辞例篇”却论到了甲骨

文的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和助词,对特殊的句法(如宾语前置)亦间有涉及,实际上已属初步的语法研究。《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扼要介绍了金文的主要代词并指出其格位之别,所论至今看来多数仍不失平实可信。古文字资料的语法研究在20年代末“热”了一阵之后,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却忽然沉寂下去了。整整二十年中,除沈春晖《周金文中之双宾语句式》和张宗騫《卜辞弼、弗通用考》两篇专文之外,就只有郭沫若、于省吾、唐兰、陈梦家、杨树达以及黎锦熙、吕叔湘、高名凯、邢公畹、俞敏等专家的著作中见到个别的零星的论述。

50年代开始,古文字资料的语法研究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其标志就是管燮初1953年《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一书的问世。该书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对甲骨文语法进行全面的描述,成为第一部、也是迄今惟一一部甲骨文语法专著。1958年开始,管氏又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金文语法的研究之中,并于1963年完成了研究报告的初稿,定名为《西周金文语法研究》,于1981年正式出版。管氏两部专著尽管在资料运用以及研究方法上都存在一些缺陷,但毕竟是投在这个边缘领域内的两块基石,正如王海棻所评价的那样:管著就“像一座桥梁,把古文字研究和语言研究这两个一度隔绝的学术领域连接起来”(《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在《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问世后不久,陈梦家1956年在《殷虚卜辞综述》“文法”章中对甲骨文语法作了更为深入的探索。陈著的最大特色是立论新颖,比较注重发掘甲骨文语法的特殊点,例如:否定词“不”字可置于全句之前否定整个命题,宾语前置无形式标志,等等。

除了管、陈的系统描述语法之外,还有两类概观性的论著,一类是汉语史专著,一类是宏观探讨的论文。将古文字资料的语法研究成果融入汉语史而卓有成效的是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